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之曹操形象比较研究

The comparison study of Cao Cao's image between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科目编号: ULSZ 3094

学生姓名: 颜梓恩 GAN ZI EN

学位名称: 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 余曆雄 博士 Dr. ER LEE SIONG

呈交日期: 2017年8月11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u>目次</u>	<u>页数</u>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绪论	1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1
第二节、研究综述与文献	2
第三节、研究范围与方法	5
第四节、研究难题与限制	7
第二章、《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	9
第一节、褒甚于贬——“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9
第二节、曲笔回护——“多所残戮”等负面形象	14
第三章、《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20
第一节、贬甚于褒——蜀汉人物形象之反衬	20
第二节、奸中之雄——“奸”与“雄”之结合	25

第四章、曹操形象的历史演变	30
第一节、西晋至唐——负面形象的形成及发展	30
第二节、北宋至清——负面形象的深化及定型	35
结语	41
参考文献	43
附录一	52
(一)、曹操之相关诗、文	52
(二)、曹操以外之相关诗文	57
附录二	59
表(一)、曹操之相关大事年表	59
表(二)、曹操形象之历史演变简表	63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之曹
操形象比较研究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4ALB06236

日期：

摘要

本论文以陈寿《三国志》以及《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为论述对象。在各别探讨了曹操于陈寿《三国志》中的形象，以及于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形象之间的异同之处后，进而探讨曹操形象于历史上的演变以及发展过程，并阐述造成曹操形象异化的个中因素。

陈寿于《三国志》中称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对其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在《三国志》中，曹操的形象从整体上来看绝对是褒多于贬。其中“褒”的部分主要在于其政、战方面，这一方面也被陈寿翔实而凝练地刻画了出来；而贬的方面则在于曹操为人嗜杀的一面。对此，陈寿则作出了曲笔的描写。

《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刻画则恰好相反，从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曹操奸险的方方面面，绝对是贬多于褒。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整体形象就是作为蜀汉主要人物的陪衬作用，以其之奸险来凸显出刘备的“仁”，诸葛之“智”，以及关羽之“义”。在除此之外的个体形象中，才显示出曹操智勇兼备的一面。

欲厘清上述的情况，则需先立足于文本上的探讨，进而分析，并作出对比。因此本论文共分为四个章节对主题作出相关的重点论述。第一章为绪论，共有

四节，其中分别为：笔者的研究动机与目的、笔者之研究综述与文献之掌握、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与方法、最后是本论文的难题与限制之处。

第二章为《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共分两节。第一节先从陈寿对曹操之褒扬谈起，进而探讨其在历史上的光辉形象。第二节则试图发掘曹操于《三国志》中所记载的负面形象，进而探讨陈寿对曹操负面形象的曲笔之处。

第三章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分为两节。第一节先探勘曹操是何如成为蜀汉人物之反衬的存在，进而说明其于《三国演义》中的贬甚于褒之处。第二节则试图从个体形象方面发掘曹操于《三国演义》中的雄略之处，进而探讨其在《三国演义》是如何的“奸”、“雄”合一。

第四章则继承自第二、三章的论述结果，进而探讨曹操的形象是如何在历史发展中演变，以及最后进入到《三国演义》之中。全章将会以时间轴作为论述方向，第一节先从西晋至唐代谈起，第二节则接以北宋至清。此外，为便于浏览，笔者将会整理出论文中的部分相关资料，并编成附录于全篇之末。

【关键词】 《三国志》；《三国演义》；曹操形象；比较研究

致谢

从三国情缘谈起——记得约十岁的时候，当时的“新传媒”频道每星期晚都会播出九四年版的《三国演义》连续剧。当时由于父亲的督促，因此全家人都必须早睡。然而待父亲熟睡后，母亲便会把笔者从房里唤出来一起观赏。开始觉得很无聊，也看不懂剧里头究竟在演啥。然而由于母亲这个“旁白”不断地在旁解说，加之有问必答，因此渐渐地便喜欢上了《三国演义》。记得初中一时的一份生日礼物，便是文言版的《三国演义》。对此笔者一直是手不释卷，爱不释手，也由此而渐渐地延伸出对其余中国古典小说的喜爱。后来笔者在大学之所以会选念中文系，很大程度上也是缘起于此。笔者从小就非常佩服曹操，因为其虽然是个“坏人”，但是也是最“成功”的人。到了高中时期，渐渐地发掘到了曹操的历史面貌，因而便产生了想彻底研究一番的想法。笔者的这份论文，权当是慰藉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兴趣和疑惑。

然而光有兴趣并不能当作撰写论文的“粮食”。在大学三年的时间里，笔者也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一事实。因此在指导老师的建议下，笔者从撰写论文之初便开始广泛收罗以及阅读各种相关的文、史资料，以充实自己浅薄的学问。对此，笔者想对余曆雄博士致上万二分的谢意。余老师学富五车，知识渊博，笔者也有幸从大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都修读了余老师所执教的科目。余老师的教学方法非常独特，老师从不作寻章摘句，或单纯之依文解义的教导，而是划出重点主题后，便旁征博引，并将各种文献资料丝丝入扣的与主题串联起来。因此，在余老师的每一堂课当中都能够获益良多，“胜读十本书”。在笔者撰写

论文时，但凡遇到桎梏的情况向老师请教时，老师总是能够侃侃而谈，孜孜不倦。一座谈论之后，其中的精言辟语往往使笔者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因此在敬佩老师的同时，更多的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感激之情。然而，笔者愚陋之人，有时会觉得“虚不受补”，加之论文中不免会有许多的谬误之处，因此总是觉得有负老师厚望，歉愧不已。

感谢身边的每一位朋友，以及我最亲密的人。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何况于众人乎？中文系的同修们对笔者在大学三年中的鼓励与启发，是笔者心中永远的宝贵财产。没有大家，就没有学习上的乐趣，更不会有学业上的进步。笔者非常珍惜与大家相互驰骋、切磋的三年时光，如今眼瞅着离别在即，不免使人唏嘘不已。此外，贤伴郑茹梅于自身也在撰写其毕业论文的情况下，对笔者还时时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时而还会帮笔者料理饮食，可以说是笔者心目中的一份感动。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但求与君长久携手共勉。最后，感恩家人在笔者大学三年时的每一份情怀。尤其是辛勤持家与工作的双亲们，您们暗中的全力支持，不仅使得笔者免去了许多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还使笔者于学习路上的前景充满希望。笔者对您们的天高地厚之恩无以为表，定会铭刻于心，日后反哺报答。祝您们身体健康，永远安乐，感恩！

第一章、绪论

此章分四节统摄。第一节阐明本论文的研究动机与目的。第二节述说研究综述，包含前人研究成果等。第三节说明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最后，第四节将提及本论文中的研究难题，以及限制范围。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论文主要探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之曹操形象。通过两者之间的对照，进而阐述曹操在历史与文学中的形象内涵，并进一步探讨曹操人物形象的演变。是以《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之曹操形象比较研究作为论文选题。

曹操字孟德，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然而其形象在历史发展中却始终不一，如：“汉贼”、“奸雄”、“能臣”、“英雄”等。正因时褒时贬，加之各类正史野史的记载，以及《三国演义》的广泛艺术演绎，才让曹操的形象最终出现如此之大的分歧。

这在中国历史人物的发展史中无疑是一朵奇葩。即使是同时期的历史人物，如诸葛亮、关羽等人，在后世无非是被一味的褒扬，甚至发展成诸葛近圣、关羽近神。因此不免使笔者产生了若干疑问，如历代典籍中对曹操的记载有甚不同？曹操的形象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其又是如何从一个历史人物最后

进入到文学人物当中？综上所述，引起了笔者的好奇与兴趣，从而产生了探索此课题的动机。

对曹操的研究历来也不乏其人，这也是由于其自身历史地位的影响之故。若从西晋时期算起，对曹操的“研究”至今可说已不下一千七百余年。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在学界也不陌生，历来前辈学者亦有多种精彩的相关作品问世。只是由于曹操形象课题的可涉及面实在广袤，而单一作品的论述范围有限，因此有关曹操形象课题的研究还是极有运作的空间。因此，笔者以浅薄的认知和有限的学力完成了此篇论文，由此而对曹操的形象有了更系统，以及全面性的了解。

第二节、研究综述与文献

由于对于曹操的研究历时已久，因此值得精读的名山之作也为数颇多。笔者在撰写论文时，便能从中汲取不同的精华，精益求精。关于对《三国志》的整理与研究，有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吴金华的《三国志校诂》；钱仪吉的《三国会要》；赵幼文的《三国志校笺》；缪钺的《三国志与陈寿研究》等。这些前辈学者的著作中，提供了笔者非常丰富的研究资料。此外，高秀芳的《三国志人名索引》也为笔者在史籍的翻查上提供了许多便利。

对于三国历史与人物背景方面的研究，有陶元珍的《三国食货志》；何兹全的《三国史》；张大可的《三国史研究》等。这些前辈学者的著作中，都有

大量关于三国历史背景的论述。此外，吕思勉的《三国史话》；黎东方的《黎东方讲史·细说三国》；以及方北辰的《三国名将》，对部分三国史事、人物等都有独到的评价。谭其骧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加深了笔者对于三国时代地理方面的了解。

三国相关人物方面的研究，还有谭良嘯的《三国人物评传》；方诗铭的《方诗铭论三国人物》；张作耀的《曹操评传》等。《曹操评传》侧重于探讨曹操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之得失，很具启发性。此外，夏传才的《曹操集注》也收录了曹操大量的文学作品。杨耀坤的《陈寿、裴松之评传》使笔者在了解陈寿撰《三国志》时的背景有一定的帮助。

至于对《三国演义》的整理与研究，则有《三国演义研究集》；朱一玄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沈伯俊的《三国演义辞典》等，其中广泛收录了许多前辈名家的研究成果，因此提供了笔者在查找《三国演义》各方面资料时的许多便利。此外，李厚基的《三国演义简说》；陈其欣的《名家解读三国演义》等，都对《三国演义》中的情节内涵以及人物形象有相当具体的探析。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则有许多方面的集大成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在学位论文方面，笔者也发现数篇具启发性的硕士论文。如杨静静的《朱熹论三国》，是谈朱熹正统观念下的曹操形象；张检的《曹操形象文学传播研究》，则是针对探讨历代各文学作品中的曹操形象；闫利纲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形象源流探析》，主要是侧重于对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曹操形象探讨；

曹龙的《曹操形象演变研究》，主要是重点涵盖曹操在历代的形象变化；何文的《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人物形象流变研究》，则是侧重于对《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内涵的探讨。

最后是期刊论文方面的资料，其中对于曹操研究做出重点讨论的学者也为数不少。如蔡东洲的〈宋儒的魏蜀正伪论争与改修《三国志》之风〉，主要是探讨宋代正统论对《三国志》的影响；单长江的〈曹操形象异化的时代价值取向〉，则讨论了曹操形象异化的部分因素；傅隆基的〈曹操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典型的演化〉，分析了曹操在历史上的两面性性格；魏巍的〈从《武帝纪》看陈寿的尊魏思想〉，则提出了陈寿对曹操曲笔回护的几个方面；吴代芳的〈论《世说新语》刻画的曹操形象及其发展〉，指出了曹操的负面形象和《世说新语》的刻画有着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为本论文之研究综述。由于个人有限的知识，故在撰写论文时，自忖对于相关文献的掌握尚属不全，此实属憾事。但依循现有的文献资料，笔者更加笃定了自身的研究范畴。在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整理、提炼与吸收的同时，希望也能提出对些许微末之见。篇幅所限，除了上述所提及的文献以外，其余的相关资料将于参考文献中全数罗列。

第三节、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论文主要分四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为绪论，当中将扼要说明笔者撰写论文之动机与目的、对于前辈学者的研究综述与文献之掌握、撰写论文时的研究范围与使用方法、最后则为本论文中的研究难题与各种限制等。第二章则侧重探析史籍《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曹操形象。笔者发现陈寿对曹操的记载，尤其在《武帝纪》中，颇有溢美之词；而对于某些方面则作了曲笔的描写。因此，当中便有值得探析之处。

第三章侧重于探讨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几经翻查与对比，笔者发现《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其形象与史籍中的记载简直大相庭径。从个体描写上看，曹操的辉煌面被小说弱化；而从整体描写上看，曹操则更多成为了蜀汉主要人物的形象之反衬。因此，《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相当独特，其许多两面性的形象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而这其中的内涵也是笔者欲探讨之处。

第四章将进而论述曹操形象之历史演变。笔者发现曹操的“最终形象”绝非一蹴而成，更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因此，笔者将分别述说从西晋开始直至明清时期，曹操形象所历经的主要演变，并阐述影响其变化的相关典籍，并试图从中分析造成曹操形象异化的因素。

在撰写本论文时，笔者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文本释义法、文献探讨法、历史研究法、以及文史结合法。文本释义法即，“立足文本，以解释者的身份分析、揭示作品中所展示和蕴含的含义，包括作品中所萌芽的新的倾向……”（王先霏、胡亚敏主编，2005：49）因此，通过客观与系统性的方法，针对文本《三国演义》等作品内容进行研究与分析，从而推敲出文本内容以及其背后所蕴涵的含义。曹操的形象研究可以通过针对文本的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

完成一篇论文，资料的旁征博引势不可少。文献探讨法即广泛搜集现有的相关研究资料，诸如学者的专著、论文、期刊等文献以为参考，再透过对于相关资料的阅读、分析、取舍等，并将其过滤提炼为协助笔者研究论文主题的材料。本论文侧重于曹操形象的探析，因此必须使用广泛而合适的研究资料以为论点论证，而许多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使得笔者广开思路。

有关曹操的形象探讨，首要还是必须回归到历史之中。历史研究法即引用史籍中的文献资料以为基础，并循序渐进地研究、拼凑相关的事件，方能准确的掌握曹操形象之原貌。因此，诸如《三国志》与其中的裴松之注，《后汉书》、《后汉纪》、《晋书》、《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等皆是笔者的首要参考资料。通过对比各种史籍中的文献记载，则能更翔实的掌握与本论文之主题内容相关的资料。

若然只依循史籍中的资料进行单方面的分析，那么所得出的结论则不免仅为“历史曹操”。曹操真实的历史形象固然重要，本论文也必须先立足于此；

然而其在文学中的形象之重要性亦不可忽视。比如，欲探讨曹操形象的演变，那么“文学曹操”的重要性则不在“历史曹操”之下。因此也必须参考除史籍以外的相关文学性作品，方能更为全面的探讨关于曹操形象的问题。诸如《世说新语》、相关唐代诗文小说、《三国志平话》、相关元杂剧、《三国志通俗演义》、及《毛评本三国演义》等，也是笔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四节、研究难题与限制

关于研究难题，曹操在学界上的关注度虽然不低，但主要都是各别性的针对探讨，或历史曹操、或文学曹操、或以个人观点评价曹操、或有多方面的论述但针对性不全等。因此，笔者在撰写论文初期时，主要面对与参考文献相关的问题。这是由于有关曹操研究的专门性质的典籍在图书馆内为数有限，以及网络上刊载的论文在质量上又稍显良莠不齐等。

因此笔者只得与师友们多加讨论，并尽可能的网罗相关资料、下载电子书籍、以及海外购书等。笔者自忖，在文献方面的掌握还是不够全面，因此不免有些遗憾。此外，即使是史籍上所记载的曹操资料，在某些方面也是有所不同，甚至有部分矛盾之处，加之千百年来对于曹操的“史料”更是有增无减，因此如何有效处理，对于笔者来说也是一项挑战。

单就陈寿的《三国志》来说，在《武帝纪》中其对曹操的刻画大都是溢美之词，是正面的形象。因此欲更加了解曹操，就不得不大量参考《三国志》中

其他相关的人物传记以为对照，既要费时更须费神。此外，曹操的历史形象固然重要，但其文学形象上的刻画也不能忽略。因此，应如何正确地看待曹操的两种形象，也是一项新的挑战。

关于研究限制，主要是在论文形式上的限制，使得笔者不得不对主题与章节仅做出相关性的重点论述，加之又有时限上的难题，因此在论述过程中难免可能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但求尽善尽美耳。此外，关于曹操的研究在某些方面，至今尚无统一的定论，故皆存而不论。比如有关曹操家世的问题：曹操之祖究竟为何许人也？¹部分学者在研究曹操时都有触及于此²，只是由于证据实在不足，故而至今也只有较受认同的看法。兹举一例，余不遑赘论。

¹ 陈寿谓操为“相国曹参之后”，又谓嵩曰：“莫能审其出生本末”，显然这既为曲笔而又有所矛盾。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与《世语》曰：“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见【晋】陈寿撰（1964），《三国志》（第一册），页 1—2。那就和曹参没什么关系了。另，陈琳于《为袁绍檄豫州文》曰：“父嵩，乞丐携养……操赘阉遗丑”。见【梁】萧统编《六臣注文选》（下册），页 822。亦说曹操是个出身不明之人。

² 黎东方认为曹操非夏侯氏之子，因其将女儿嫁于夏侯惇之子夏侯懋，古同姓不婚。详见黎东方著（2013），《黎东方讲史·细说三国》，页 81。另，张作耀认为曹嵩既已嗣人，就非本家之子，因此并不违背同姓不婚之教。虽然如此，其也并无彻底认同曹操为夏侯氏之子，仅认为最有此可能。详见张作耀著（2000），《曹操评传》，页 30。另，吴金华认为陈寿既将“诸夏侯曹”合并作传，可见曹氏与夏侯氏确有亲属关系。详见吴金华（1990），《三国志校诂》，页 1—2。另，王钟翰于《〈三国志〉裴注考证》中罗列了四种古说，并指出“异说纷纭，其实已莫能正。”详见张越编（2009），《〈后汉书〉、《三国志》》，页 373。总而言之，还是无有定论。关于这点，王鸣盛说得对，所谓“帝王之兴，不容无本。据传闻者书之，聊复尔尔。”详见【清】王鸣盛著（2005），《十七史商榷》，页 280。追溯帝王本原，其实仅为一种惯例罢了。

第二章、《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

此章分两节统摄，并以陈寿《三国志》之原文为主要依据³。第一节分析曹操之正面形象，而第二节则侧重探讨曹操之负面形象。主要藉此以呈现出曹操的原始形象之特色。

第一节、褒甚于贬——“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史学家为人物修史作传时，一般在篇末都会总括自己对于该人之见解，或议论、或褒贬、或辨伪等，以表明自身看法。《史通卷四·论赞》曰：“《史记》云太史公……陈寿曰评……其义一揆。”（【唐】刘知幾撰，1978：81）《三国志》中的曹操，总结来说是个文武全才之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学上都有独到的建树。陈寿本人对曹操就赞誉有加，这点从其对曹操之评价“……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晋】陈寿撰，1964：55）中就可以看得出来。⁴陈寿总结了曹操一生的优点，同时也点出了其之所以能成就一番霸业的原因。此番见解从某些方面来说，可谓是独到而公允的⁵。

³ 诸如《三国志》的成书过程与得失、陈寿的生平思想、裴松之所补之注、以及曹操是非评议等问题皆不在本章节的叙述范围之内。

⁴ 陈寿本人对曹操是颇为敬仰的，这点从曹操在《三国志》中的文字的分量上来看便一目了然。《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其中明确提及曹操的就多达五十八卷。详见高秀芳、杨济安编（1980），《三国志人名索引》，页 218—223。这样的文字分量在《三国志》中是其他三国人物所远不能及的。

⁵ 即使是处于敌对立场的鲁肃、诸葛亮等人，对曹操也有颇高的评价。鲁肃对孙权说：“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曹操不可卒除。”见【晋】陈寿撰（1964），《三国志》（第五册），页 1268。另，诸葛亮也认同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见李伯勋撰（1997），《诸葛亮集笺论》，页 194。可见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相当中肯的。

曹操戎马一生，从其军事生涯来看，主要有三个里程碑⁶。其一、败袁术、吕布，攻占徐、扬，并控制了黄河下游的大片地区，从而有了跟北面的袁绍进行对决的资本。其二、打败了群雄当中势力最大的袁绍，攻占冀、青、幽、并，并一统北方，从而为曹魏政权奠下基础⁷。其三、败马超、韩遂、张鲁，平定关中、凉州等地，使得曹魏成为了三国鼎立之中国势最强的一方⁸。（谭良啸、张大可主编，1992：67—74）这是曹操在其军事方面的主要成就。

曹操极善用兵以及揣度人心，加之其不屈不挠的作战精神，因此往往能够出奇制胜。在一次与张绣、刘表的联军作战时，曹操巧用孙子兵法中“**死地则殊死战也**”（【春秋】孙武撰，1999：243）的道理，最后成功反败为胜。在官渡之战时，曹操利用了袁军贪婪的心理，假意抛弃辎重，等敌军涣散时，再一鼓作气攻入地阵，斩杀了敌军的大将文丑。此外，曹操为人重法，令出必行，认为“**礼不可以治兵也。**”（【春秋】孙武撰，1999：57）因此，在曹操所发布的《军令》⁹、《船战令》¹⁰、以及《步战令》¹¹等将令中，皆可以明显看到曹操治军的严谨态度。这也是其作为一名军事家所值得肯定的一面¹²。

⁶ 若以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黄巾起义算起，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一一九）曹操南征关羽结束，其一生戎马三十余年。其中曹操亲历的主要战役皆是胜多败少。详见张可礼编著（1983），《三曹年谱》，页4—167。另，上述战役皆见载于台湾三军大学编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四册）中的“曹魏开国之战”，此不赘谈。

⁷ 陈寿评曰：“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见【晋】陈寿撰（1964），《三国志》（第一册），页22。曹操其不可动摇的军事地位也由此开始。

⁸ 具体年份见附录二表（一）。

⁹ 见附录一（一）。

¹⁰ 见附录一（一）。

¹¹ 见附录一（一）。

¹² 这和曹操个人的治学态度有关。曹操好诗、书，“虽在军旅，手不释卷。”见魏宏灿校注（2009），《曹丕集校注》，页302。曹操尤其对兵书有颇多的心得，其著有《孙子兵法注》、《太公阴谋解》、《兵书接要》、《魏武帝兵法》等，皆见载于《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见【唐】魏征、令狐德棻撰（1982），《隋书》（第四册）页1012—1014。

曹操知人善任，并以才能纳贤，认为取天下第一靠的就是人才。他曾在起兵之初对袁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晋】陈寿撰，1964：26）。曹操在其《短歌行》¹³中亦叙己求贤若渴之心，从不会满足对人才的招纳。曹操还破格启用过去背叛过自己之人。如曹操曾因魏仲的背叛而雷霆大怒：“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后来魏仲被擒并解赴曹操处时，曹操还是将其亲自松绑，赦免了他并将其官复原职，只因魏仲是个人才。（【晋】陈寿撰，1964：16—17）曹操还曾发布《求贤令》¹⁴以及《举贤勿拘品行令》¹⁵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的任人唯才，虚心纳谏之心。也正因如此，曹操手下才会谋士云集，勇将如云¹⁶。

在政治方面，毛玠曾对曹操说：“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晋】陈寿撰，1964：374—375）曹操采纳了其意见，并以此为方针施行，很好地发展了自己的力量。毛玠所言，其中的两处重点在于“奉天子”以及“修耕植”。当时的诸侯想在乱世之中图存，对待汉庭的态度可以说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大政治问题。此外，如何在兵荒马乱的世道中寻找一条行之有效的经济来源管道，也是各军阀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前者如董卓之行废立，“遂废帝为弘农王……立灵帝少子陈留王，是为献帝。”

袁绍之行另立，“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以及袁术之行自立，“用河内张

¹³ 见附录一（一）。

¹⁴ 见附录一（一）。

¹⁵ 见附录一（一）。

¹⁶ 若以三国中官职出任者之完备，来看三国之人才的话，当是曹魏第一，孙吴第二，蜀汉则最少。因此《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中才载蜀汉人才中甚至没有能够胜任三公之职者。详见【晋】常璩撰（1987），《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页 409。虽说三国之中人才多寡主要是源自于地理上的关系，可是笔者认为，这也和曹操本人“尚贤”的政治态度有莫大的关系。

炯之符命，遂僭号。”（【晋】陈寿撰，1964：174—209）上述的表现都反映了当时诸侯们各自的政治目光之浅显。反观曹操，其对汉帝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知，因此他毅然选择了拥立¹⁷。其结果是，曹操争取到了与诸侯在政治角力上的主导权。

东汉末年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以致“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晋】陈寿撰，1964：12），以及“二三年闲，关中无复人迹。”（【宋】范晔撰，1973：页 2341）曹操的《蒿里行》¹⁸，王粲的《七哀诗》¹⁹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当时的民生惨况。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饥荒问题，在曹操看来是刻不容缓的。因为只有先解决粮食问题，才有可能对外用兵，继而扩展势力。（何兹全，1994：27）为此，曹操便采取了屯田这一经济措施。

曹操拥立汉帝，迁都许县之后，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下，遂即颁布了《置屯田令》²⁰施行屯田²¹，并听从袁涣、国渊等人的意见后不断地将制度改善，并相继在各州郡推广施行。其结果是“百姓大悦”以及“五年中仓廩丰实，百姓竞劝乐业。”（【晋】陈寿撰，1964：334—339）陶元珍也指出，较之吴、蜀两国，

¹⁷ 曹操对待废汉一事相当的慎重。他认为：“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不亦危乎！”见【晋】陈寿撰（1964），《三国志》（第一册），页 4。由此可见曹操在政治目光上是独具慧眼的。

¹⁸ 见附录一（一）。

¹⁹ 见附录一（二）。

²⁰ 见附录一（一）。

²¹ 缪钺在《冰茧庵读史存稿·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中简单指出，屯田制是将流离失所的农民们聚集起来，由国家供给耕牛农具，在已荒废的土地上进行开拓及生产。详见缪钺著（2004），《缪钺全集》（第 1 卷），页 102—103。另，有关屯田制的具体运作及其收效，皆见载于张作耀《行屯田以资军食》中，此不赘谈。详见张作耀著（2000），《曹操评传》，页 101—112。

曹魏的屯田制在三国时代中是最为发达的。（陶元珍著，1935：41）因此，曹操推行屯田，使得百姓饥荒的问题既得到了解决，同时也充实了自己的经济力量。

曹操拥有心系百姓的一面，对百姓的政绩亦为数不少。如官渡之战时，曹操在解除了白马之危后，由于担心袁军再次来袭，便“徙其民，循河而西。”

（【晋】陈寿撰，1964：19）在一统北方之后，曹操随即着手整顿教育。由于连年的战火，致使教育荒废，“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因此曹操便在各个郡县内“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晋】陈寿撰，1964：24），以兴办学风。由此可见，曹操除了任人唯才以外，对士子们在品德方面亦非常的讲究。

每当曹操在历经了大型的战役之后，都会抚恤受苦的老百姓。官渡之战后，曹操发布了《蠲河北租赋令》²²，不仅免去百姓的租赋，还遏制了当地豪强对土地的兼并。赤壁之战曹操兵败班师之后，也发布了《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²³，让官府奉养军士中的老弱病残。汉中之战后，曹操发布了《贍给灾民令》²⁴，表示了对孤苦百姓的关怀和一系列措施。此外，由于从前曹操曾多次担任治理地方之职²⁵，因此其对于司法的公允也非常在意。曹操在其《选军中典狱令》²⁶、

²² 见附录一（一）。

²³ 见附录一（一）。

²⁴ 见附录一（一）。

²⁵ 曹操曾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济南相等掌管民生治安之职，于任上多有政治建树。具体年份见附录二表（一）。

²⁶ 见附录一（一）。

以及《以高柔为理曹掾令》²⁷中指出，刑法直接忧关到百姓的性命，也是拨乱为正的關鍵，因此特置理曹，并以高柔为理曹掾²⁸。

第二节、曲笔回护——“多所残戮”等负面形象

陈寿的《三国志》以魏为正统²⁹，故在予曹操作纪时，对其缺点或不光彩的一面难免就会有所掩饰，或零星数笔带过，或移录于别传等。这当中的原因在于：一、陈寿身为晋臣，受客观因素的局限，不得不作政治上的考量；二、史学家的正统观。晋绍于魏，而魏绍于汉，乃是王朝更替的正式法统。（魏巍，2015：72—74）因此，就陈寿本身的立场而言，欲尊本朝则必先尊魏，对魏国的奠基者曹操才会以颇费心思的笔墨进行渲染、润饰。

如曹操在拥立汉帝之后所任之一切官爵，在《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中皆载其为“自为”、“自领”、“自立”、“自号”等，皆是出于曹操本人的意愿行事，而这也符合史实。然而，《武帝纪》中陈寿则作“以公领”、“以公为”、“策命为”、“天子使”等，完全是由皇帝一手所任命。³⁰（杨耀坤、伍野春著，1998：

²⁷ 见附录一（一）。

²⁸ “理曹”是曹操为相后所设的一个部门，专主刑法、牢狱，而其中的正官员称为“掾”，副官员则称为“属”，两者合称“掾属”。详见【宋】熊方等撰（1984），《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下册），页1286。

²⁹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曰：“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见【唐】魏征、令狐德棻撰（1982），《隋书》（第四册）页957。

³⁰ 赵翼指出，由于司马氏父子和曹操在加官进爵时，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而陈寿欲保持其书法的统一，在《武帝纪》中就不必对曹操也作出同司马氏父子一样的曲笔。详见【清】赵翼著（1984），《廿二史劄记校证》（上册），页121。这就是所谓的“尊晋则必先尊魏”之例。

100) 此外,《武帝纪》开篇则掩饰了曹操的出身,说其为汉丞相曹参之后,这是为了给曹操添上统治光辉³¹。

曹操虽爱才,但对属下也多有猜忌。《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曰:“太祖性忌……皆以恃旧不虔见诛。”(【晋】陈寿撰,1964:370)因遭曹操所忌而被杀害的臣子中,有崔琰、荀彧、杨修等人,皆为名士。因此,这也是曹操较为让人诟病的一面。对此,陈寿的处理方式为:或于《武帝纪》中只字不提、或录于他传、或于他传中曲笔掩饰等。

如崔琰为人刚毅,曾数次以理直言曹操。曹操起先是“改容谢之”,后来“亦敬惮焉”(【晋】陈寿撰,1964:368—369),最后借机将崔琰贬为奴隶,并将其收监赐死。另外,曹操的心腹毛玠仅因崔琰的死而心生不快,就因此而被曹操罢黜,还险些丧命。对此陈寿虽然认为这是一桩冤案,但是是由于崔琰对曹操不恭敬所导致的,并无从义理方面对曹操加以批评,这也是对曹操的回护。

荀彧虽是曹操的股肱,可是其对曹操欲进爵为“公”一事表示了彻底的反对。后来曹操以“软暴力”的方式迫使荀彧自杀³²,这在《后汉书卷七十·荀彧传》记载的较为翔实。然而在《三国志卷十·荀彧传》中的描写则为,“彧疾留

³¹ 曹操的父亲叫曹嵩,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而曹腾的父亲叫曹节或曹萌(版本不同),是一名处士。曹操的祖上只能追溯至此,后来魏明帝曹睿在其诏书中溯其祖上也止于此。详见周天游辑注(1986),《八家后汉书辑注》(下册),页487—488。将曹操和曹参作联系的是陈寿,由于论据不足因而后人多疑此说。

³² 荀彧一生对曹操可谓功勋彪炳,非常受曹操敬爱,称“吾之子房”。然而,在受到猜忌之后,曹操便数次借机将年近五十的荀彧东征西调,使其疲于奔走。直至荀彧染病时,曹操还特意派人送给荀彧一个空的器皿,其中的内涵为,器皿无物可盛(意为多余,没有意义、价值了),于是荀彧便服毒自尽。

寿春，以忧薨。”（【晋】陈寿撰，1964：317）这是明显的在为曹操杀害功臣之举作掩饰。至于杨修，也因为遭曹操所忌而被杀³³，而《三国志》中也不为二人立传，其事见于《后汉书》而已。

曹操为人暴戾的一面还体现其弑董贵人以及伏皇后一事，而此事在《三国志》中则被陈寿掩饰，甚至“咸杜口而无言”。（【唐】刘知幾撰，1978：193）董承的女儿是汉帝的“贵人”，董承等人由于“衣带诏”³⁴一事计划败露而皆被曹操所杀。曹操之后便入宫要杀董贵人，而董贵人时已有孕在身，汉帝也为之百般求情，可曹操终究还是把董贵人处死。对此，陈寿仅在《武帝纪》中以“董承等谋泄，皆伏诛”（【晋】陈寿撰，1964：18）一笔带过，其余不谈。

伏皇后于是写信给父亲伏完求助，之后事迹败露也被曹操发觉。曹操让华歆带人入宫把伏皇后拖了出来将其幽禁，并把伏后所生二子毒死，还诛杀了伏氏一族³⁵。此事于《武帝纪》中载曰：“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晋】陈寿撰，1964：44）这明显又是为曹操的大逆不道作开脱，此外在《华歆传》中

³³ 方北辰于〈正说“鸡肋”与杨修关键死因之谜〉中指出，杨修之死固然是因其锋芒太露，而遭曹操所忌导致。然而，其中的关键因素并非在于杨修的“才智”方面，而是其身为“袁氏之甥”的家族背景与“魏讽反叛”的事件风波，才是致使曹操杀死杨修的主要原因。详见方北辰著（2016），《精彩三国》，页37—44。

³⁴ “衣带诏”一事为汉帝以曹操专横擅权，故破指以血书诏云云。此事在《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中被描写为董承“自称”受密诏讨曹。见【晋】陈寿撰（1964），《三国志》（第四册），页875。这又是护曹一曲笔。按此事不会有假，先不说皆见载于其余正史当中，就以当时情况而论，董承贵为车骑将军，而刘备既依附在曹操的麾下，且身居左将军，因此董承犯不着凭空捏造此事以身家性命犯险，况以刘备的为人来说，更加不会傻傻的被董承所鼓惑。

³⁵ 值得一提的是，伏后之父伏完并非曹操所杀，伏完病死于建安十四年，而此事发生于建安十九年。此处被杀的应当是指伏完之子，即伏典兄弟等人。见赵幼文校笺（2001），《三国志校笺》（上册），页64。

也完全不记载此事。上述事迹于《后汉书》³⁶、《后汉纪》³⁷、甚至裴松之于《武帝纪》作注皆有记载³⁸，而后世学者亦多有考证³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⁴⁰中也载入此事。后人对此也多有挞伐⁴¹。

曹操在几次战役时也极为嗜杀。如在对徐州的陶谦用兵时，过程就非常之残暴。这是由于曹操的父亲被陶谦部将的士兵所杀，而曹操遂借报仇之名攻打徐州。（【宋】范晔撰，1973：2234）《武帝纪》中则载道：“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⁴²（【晋】陈寿撰，1964：11）明显是把事情本末倒置，而对曹兵的残暴也移录到了《陶谦传》之中。因此须以二者结合互看⁴³，个中之事才较为完整。《后汉书》直接记载了凡曹军所过之处皆屠城，鸡犬不留，几十万百姓被杀，尸积如山，甚至连河水都为之不流。

³⁶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与《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中皆载董承、董贵人与伏完、伏后之事。见【宋】范晔撰（1973），《后汉书》（第二册），页453—454。

³⁷ 《孝献皇帝纪卷第三十》载伏后被废，是曹操使人为之。见【晋】袁宏著（2002），《后汉纪》（下册），页585。

³⁸ 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中伏后恳求汉帝相救，汉帝对伏后说自己尚且难保，并对郗虑说，天下还有这样的事吗！见【晋】陈寿撰（1964），《三国志》（第一册），页44。

³⁹ 卢弼总结了许多学者的观点，并指出华歆本人是从东吴入仕曹魏，加之其并未为曹魏立下任何不世功勋，而官位却能平步青云直达三公之列，其趋炎附势之心又昭然若揭，因此相互对照一看，其中的玄机已然是不言而喻。详见【晋】陈寿撰（2009），《三国志集解》（第三册），页1229—1231。

⁴⁰ 其所载兼同《后汉书》与《后汉纪》。见【宋】司马光编著（1976），《资治通鉴》（第五册），页2133—2134。

⁴¹ 此举一例，陆机于《辨亡论》中评曹操曰：“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人怨。”见【唐】房玄龄等撰（1974），《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第五册），页1470。主要就是指的这些倒行逆施之事。

⁴² 赵翼提出两处辨疑，第一、陶谦平生并非嗜利忘害之人；第二、曹操在父亲被杀以前并未对徐州用过兵，因此曹操实际上是藉此趁势用兵罢了。详见【清】赵翼著（1984），《廿二史劄记校证》（上册），页123—124。

⁴³ 王改萍指出，《三国志》采用‘互见法’记述人物，使人物的言行品性得以集中体现，并全面、立体的反映出人物形象。因此，在互文比对的情况下，对于人物形象才能有比较客观的认识。详见王改萍（2010），〈试析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描述为视角〉，《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页118—119。

张邈因投靠吕布而被曹操攻打。曹操在围攻张邈之弟张超时，把整座雍丘城屠毁，还把张超一家全数杀死。（【晋】陈寿撰，1964：222）《吕布传》也记载曹操在攻打吕布时，屠杀彭城的情况。综上所述，陈寿仅在《武帝纪》中谓其“**所过多所残戮。**”（【晋】陈寿撰，1964：11）此外，《后汉书·孔融传》中亦载曹操在打败袁绍时屠杀邺城，以及霸占袁氏妻女的情况。孔融也为此嘲讽了曹操。（【宋】范晔撰，1973：页 2271）由此可见，陈寿为曹操嗜杀的一面的确多有掩饰。

曹操一生当中历经了赤壁之战与汉中之战两次大败。实际上，赤壁之败的根源是由于曹操轻敌，料敌失当所致（张作耀著，2000：182—185）；而汉中之败则是因为曹操先前失算⁴⁴，才让刘备后来处处争取到战场的主导权，最后致败。（张作耀著，2004：172—176）前者的意义在于，曹操从此失了一统天下的绝好时机；而后者的意义在于，曹操从此失去了平定西川的大好时机。（张大可著，2003：68—70）陈寿对曹操的军事成功自然是大书特书，而对于这两次关键性的败仗，则是加以掩饰。

曹操于赤壁的失利，《武帝纪》中仅载：“**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晋】陈寿撰，1964：31）然而，在《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中则描写先是周瑜分析出曹军的几处要害，接着以黄盖诈降、火攻等计谋打败了曹军。

（【晋】陈寿撰，1964：1261—1263）曹操于汉中的失利，《武帝纪》中也仅载：

⁴⁴ 曹操打败张鲁，张鲁便带人逃往巴中一带。当时刘备与曹操都积极的想招降张鲁，可张鲁“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见【晋】常璩撰（1987），《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页72—73。于是便归降曹操。曹操尽收汉中之地之后，其谋士刘晔、司马懿劝曹操乘兵锋正劲时伐蜀，曹操不予采纳，“得陇不复望蜀”，而后才悔不当初。

“引军还长安。”（【晋】陈寿撰，1964：52）然而，此事在《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中则描写为，刘备在斩杀夏侯渊，并攻占汉中的多处险要之后，曹操方才引军救援并连攻不克。（【晋】陈寿撰，1964：883—884）陈寿在《武帝纪》中对此二处的回护显然是异曲同工。

综上所述，《三国志》中的曹操总体来说是属于一个正面的英雄⁴⁵形象。从推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曹操的贡献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其在《让县自明本志令》⁴⁶中也说明了这一点，而陈寿也多是站在这一层面上去刻画曹操，着重描绘其历史功绩。（吕思勉，2015：102—105）综合《三国志》有关曹操的总体记载来看，陈寿对于曹操还是褒中带贬的，也基本做到了“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唐】刘知幾撰，1978：402）。然而，历史上的曹操确实存在让人诟病的一面，因此这也提供了后人们对曹操形象大书特书的发挥空间。

⁴⁵ 鲁迅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论及曹操时，认为从其所处的时代来看，曹操至少有英雄的作为。详见鲁迅著（2005），《鲁迅全集》（第三卷），页523—524。另，吕思勉于《论魏武帝》以及《替魏武帝辩诬》中也十分认同曹操，赞其为英雄。详见吕思勉著（2009），《三国史话》，页172—174。

⁴⁶ 见附录一（一）。

第三章、《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此章分两节统摄，并以现代整理本《三国演义》为主要参照⁴⁷。第一节探讨曹操在《三国演义》中的角色定位及其内涵，而第二节则侧重说明曹操在《三国演义》中的个体形象⁴⁸。主要藉此与《三国志》中的原始曹操形象互为对照。

第一节、贬甚于褒——蜀汉人物形象之反衬

《三国演义》即“演”三国之“义”，是以三国时代为背景，并对相关资料作出主观筛选、艺术加工等，以突显出作者个人价值观中的“义”来对历史（人物）作出评断、褒贬等。即重塑历史，以论断是非。（袁行霈，2003：29）从根本上来说，《三国演义》全书的主旨在于，带出自“春秋”以来就有的一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现象，以及广大民众对天下安宁、海内一统的渴慕之心。（陈其欣选编，1998：125—126）但是全书自始至终都表露着一种“尊刘贬曹”的主导思想⁴⁹。

⁴⁷ 现存最完整，也是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是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最早被刊刻面世的是嘉靖本，自明中叶至明末期间也相继出现了多种版本。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氏父子所修订的《三国志演义》的面世具有极大的影响，成为近数百年来的主流。直到中国建国后，在一九五三年才出现整理本，即现今所流行的《三国演义》本子。见李厚基、林骅（1984），《三国演义简说》，页11—15。为方便叙述，笔者将以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整理本《三国演义》为主要论述依据。

⁴⁸ 诸如《三国演义》的具体成书过程、相关作者与整理者、以及《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等问题皆不在本章节的探讨范围之内。

⁴⁹ 毛氏父子的改造使得《三国演义》最终定型，而“尊刘贬曹”的思想于此尤其突出。毛评本《三国演义》之〈读三国志法〉曰：“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见【明】罗贯中著（2016），《三国演义（注评本）》（第叁册），页1155。另，从目录中各章回目来看，举凡蜀汉人物则多尊称，而曹魏人物（尤其曹操），则多有贬称。故“尊刘贬曹”的主导思想，甚明矣。

《三国演义》是在以不改变整体历史的情况下，围绕着“尊刘贬曹”的情感取向编排故事，以及对人物的设置等。虽说曹操也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⁵⁰，但其形象从整体上来看几乎都是作为蜀汉主要人物形象的一种反衬的存在，尤其与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在形象上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和矛盾，这在小说中的若干情节中都有很好的体现。⁵¹（张检，2015：40）从小说的情节、语言上进行分析，则不难发现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贬甚于褒的形象。

小说中对人物初次登场时的形象描绘，以及情节安排等，都是作者有意突显该人物的某种特质。如刘备登场时就展示了其忧国忧民的形象，并侧重描绘其为汉皇后裔、孝顺母亲、胸怀大志、以及叔父“奇之”的一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正面。反观曹操一登场，作者便揭露其“冒姓曹”，点出了曹操来历不明；“叔父尝怒之”点出了曹操放荡不羁；“诈倒于地”显示了曹操自小便善于诓骗等。此外，桥玄、何颀给了曹操极高的正面的评价，曹操没有表示；而许劭给了曹操“乱世之奸雄”⁵²的评价后，曹操反而大喜。（罗贯中，1979：4—8）作者一开始便给曹操下了“奸”，的定义；而给刘备下了“仁”的定义。

⁵⁰ 《三国演义》全书一百二十回，写曹操至第七十八回。七十八回中，明确出现以曹操之名为回目的数量一共有三十一回之多。说明有三十一回皆是以曹操作为主角来进行故事叙述，从而可以看出曹操在《三国演义》中的分量之重。

⁵¹ 鲁迅于《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中指出：“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详见鲁迅著（2005），《鲁迅全集》（第九卷），页135。以此评论来看《三国演义》中对刘备等人的刻画来说是非常中肯的，比方说小说里的“刘备借荆州”、“诸葛祭风”就是十分贴切的例子。

⁵² 《后汉书卷六十八·许劭传》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见【宋】范晔撰（1973），《后汉书》（第八册），页2234。另，《世说新语·识鉴1》曰：“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见余嘉锡笺疏（2007），《世说新语笺疏》（中册），页453。语颇似《后汉书》，然谓乔玄所言也。然《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裴松之注引孙盛之《异同杂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见【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1964），《三国志》（第一册），页3。按《三国演义》盖出于此。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可以由小见大，即在一切言行举止方面，都可以展示出其品性。如曹操和刘备取天下的方式和原则就截然不同。（陈建功名誉主编，2006：145）曹操所奉行的原则在其蓄意杀害其父亲之结拜兄弟吕伯奢时就已表露无遗，“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⁵³（罗贯中著，1979：38）反观刘备，在庞统劝其攻取川蜀之地时，刘备拒绝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谄，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罗贯中著，1979：520）由此可见曹操以自我为中心做出任何事，哪怕于损人利己；而刘备却自始至终都是“仁义”之表率。

具体来说，如小说第十回中的〈报父仇曹操兴师〉与第十二回中的〈陶恭祖三让徐州〉就相互辉映成趣。曹操因为父亲一家被陶谦部将张闾所杀，便以此为借口发兵徐州趁机拓展势力，并且还把怒气发在了徐州老百姓身上。凡曹军过处，不仅人畜不留，连坟墓也都尽数掘毁。（罗贯中著，1979：87—88）反观刘备，不仅在徐州百姓有危难时仗义前来相助，并且在曹操退兵之后，刘备至陶谦死后都不肯接受其相让徐州的好意，直到全城百姓下跪请求时，刘备这才“勉强”代理州事。（罗贯中著，1979：96—103）两相对比之下又深化了曹操的负面形象。

⁵³ 裴松之注引《魏书》曰：“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这是曹操为了自卫而杀人；又注引《世语》曰：“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这是属于曹操误杀；又注引孙盛《杂记》曰：“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显然曹操心中是有后悔之意的。见【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1964），《三国志》（第一册），页5。按小说取材于此，然而却修饰为曹操义正言辞，心安理得的“奸雄”态度。

所谓英雄皆有落难时，这在《三国演义》中也有很好的刻画。小说第四十一回中的〈刘玄德携民渡江〉就生动刻画了刘备的“至仁至义”的爱民形象。由于曹军势大，于是刘备便在孔明的建议下放弃樊城，前往襄阳。然而城中的百姓至死都要跟随刘备，而刘备即便到了曹军逼近的紧要关头，仍然不弃百姓于不顾。（罗贯中著，1979：356—360）反观在第五十回中曹操自赤壁兵败后只顾赶路逃生，一旦被伤兵所累，便“斩之”。更于手下军士皆疲惫不堪之时，“喝令人马践踏而行”。军士极度悲苦，曹操便令“如再哭者立斩！”（罗贯中著，1979：433）如此对比之下，便形成一种了诛心之效⁵⁴。

曹操与刘备都曾进位王爵。然而，小说中第六十八回描写曹操进爵时杀了许多臣子，还借崔琰之口道出曹操是奸贼，并且曹操本人还“假意上书三辞。”（罗贯中著，1979：591）反观刘备却无论如何都不愿进位为王，最后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才登上王位。最后，小说在刻画曹操命终时，还刻意的将曹操“奸”的形象升华，如“获罪于天”、“设立疑冢七十二”⁵⁵等。（罗贯中著，1979：672—673）然而，刘备在命终之时却还处处考虑着汉室的兴衰，并告诉诸葛亮如若刘禅无能，自己可以取而代之等的大义之举。

⁵⁴ 傅隆基指出，虽然《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形象多有丑化，然而刘备的历史特点之一就是，其得到了爱民之广誉。一个历史人物，不论他当时对历史作出过多大的贡献，他个人的品质和人格的精神，仍旧会是影响后人对他进行褒贬抑扬的重要因素。详见傅隆基（2000），〈曹操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典型的演化〉，《华中理工大学学报》，页101。

⁵⁵ 实际上在曹操的《终令》里，显示了曹操的薄葬态度；在其《遗令》里，也明显交代了自己的墓葬处；而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曹操还告诉自己的妻妾们若有再嫁者，务必把自己的本心宣扬出去，详见附录一（一）。“疑冢七十二”是《三国演义》中奸化曹操影响最大的虚构情节之一。另，据方北辰等人的考证，这种说法是在北宋时期所兴起的，到了明初的时候则越传越玄。详见方北辰、谭良嘯主编（2015），《三国故事真与假100例》，页227—228。

曹操在用兵方面非常优秀，这点在小说中也没有刻意的去掩饰。然而自从诸葛亮出山后，曹操就处处遭其算计。举凡诸葛亮亲自参与谋划的战争中，曹操本人或其部将只要与诸葛亮对上阵便必败无疑。其中较为明显的例子为：夏侯惇兵败于博望坡；曹仁兵败于新野；曹操兵败于赤壁、汉中等，都是作者为了要突显诸葛亮“神机妙算”的一面，进而对历史进行改造或加工。（汪正章，1985：133）在这种情况下，曹魏的人物在小说中自然就被平庸化，成为反衬诸葛亮高超智慧的存在。

从品格上来说，曹操、诸葛亮虽说都身为“汉”相，但是行事风格却迥然各异，甚至可以说是两个完全对立面的存在。小说中曹操成为丞相，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进而利用天子一步步拓展自己的霸业。反观诸葛亮，在成为丞相之后，不仅没有曹操的那种骄横跋扈，反而“事必躬亲”，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甚至于曹操至死都还念及自己的霸业；而诸葛亮则多次表明自己在汉室复兴之后，就会辞官归隐，甚至于至死也都没有私置产业。（罗贯中著，1979：903）因此小说是为了提高刘备、诸葛亮等人的“义”之形象，而将曹操处处矮化，并且还将其大大贴上了“奸贼”的标签。

在历史上，关羽确实曾经因被俘而在曹操的麾下效力过，虽然最后其不忘故主，并且返回了刘备的身边。但从这一史实事件来看，曹操求贤若渴，宽宏大量的形象其实是由关羽给充分的衬托了出来。然而，由于向“奸雄”投降无论如何都是“武圣”的一个污点，因此《三国演义》经过了大量的情节虚构以及斗转星移后，将关羽“反客为主”，反而由曹操的“奸”来处处衬托出关羽

的“忠”。如曹操刻意安排关羽与两位嫂夫人同处一室而居，欲乱其君臣之礼，岂料关羽竟通宵达旦的立于户外守护。此外，小说中描写曹操千方百计地诱使关羽投降，而关羽却全然不为所动等⁵⁶，都是为了透过将曹操矮化，从而衬托出关羽的大忠形象。

第二节、奸中之雄——“奸”与“雄”之结合

从《三国演义》整体方面来看曹操的形象，绝对是贬甚于褒，而这也是在小说“拥刘贬曹”的主导思想下，曹操形象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小说中在经过了曹操形象的艺术加工，以及多方面的改造之后，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使得曹操“奸”的形象在文学以及文化领域中几成定型⁵⁷。然而，《三国演义》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其对曹操的刻画并非一味的贬低，而是在达到了抬高蜀汉人物形象的目的之情况下，对曹操的某些方面也作出一定的褒扬。简而言之，即把曹操“奸”与“雄”的两重形象在情节中加以结合，只是“奸”的成分要更多于“雄”罢了，说的更确切一点即“奸中带雄”。

这是由于：一、如果仅对曹操一味地进行贬斥，那么就会降低小说中情节的生动度，以及刻画人物的真实度；二、曹操本人的历史光环所致。曹操在历史上的确是一名人杰，也拥有抚恤军民臣子良好形象的一面，这是不争的事实⁵⁸。

⁵⁶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详见罗贯中（1979），《三国演义》（上册），页 222—224。

⁵⁷ 余如忠指出《三国演义》塑造曹操形象的手段有三：一、以“史传”为幌子，将情节以假乱真；二、转移描述侧重点，对情节进行扭曲主要；三、从个人的品评标准出发，对人物进行接化与神话。详见余如忠（1997），〈论《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变异〉，《台州师专学报》，页 38。

⁵⁸ 曹操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详见本论文第二章。

因此，《三国演义》的另一叙事特色也在于，其不对既定的历史人物之个性作出根本性的变动，即其大体上还是能够契合于《三国志》的。也正因如此，才导致曹操的个体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形成“奸而且雄”的独特现象，而要探讨这一层面，还必须把曹操从小说的整体故事中给独立出来，即单看其在《三国演义》中的个体形象。

《三国演义》中所刻画的负面形象人物有很多，如：奸险的曹操、残暴的董卓、反复的吕布、少谋的袁绍、僭位的袁术、昏聩的刘表等，皆栩栩如生。然而，在这些人物当中只有曹操堪称为“雄”，并且在上述诸侯争霸中的最后胜利者也是曹操，因此曹操在小说中的个体形象可谓是一个“奸人之雄”⁵⁹。可以说，曹操在众诸侯中是“雄”；而与蜀汉人物方面对比则是“奸”。具体来说，曹操在小说中“奸”的行为中折射出其“雄”的才能；而在“雄”的行为中又渗透着其“奸”的祸心，这种结合在小说多处都得到了体现，即权诈与智谋的并存。

小说中的第四回〈谋董贼孟德献刀〉就展示了曹操善于权变，且勇敢的双重形象。董卓进京之后祸乱朝廷，大臣们都愤恨董卓，只有曹操“**屈身以事卓者**”向董卓献媚，其目的是为了要麻痹董卓，博取信任。接着，在时机成熟，曹操前去行刺的过程中，又以“**马羸行迟耳**”巧妙地先把猛将吕布给支开，并“**惧卓力大，未敢轻动**”冷静观察，以待时机。待事迹败露时，曹操又临危不乱，以

⁵⁹ 正如毛宗岗赞赏诸葛亮的“智”与关羽的“义”一样，其亦道出曹操乃是“古今来奸雄第一奇人”，对其雄略方面也是有肯定的一面。详见【明】罗贯中著（2016），《三国演义（注评本）》（第叁册），页1157。

“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成功地在一瞬间转移了董卓的戒心。接着还“愿借试一骑”，逃出城去，从而巧妙地逃过了一劫。（罗贯中著，1979：35—36）由此可见曹操其为人沉稳并善于应变等的一面。

在刺董失败后，曹操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先发矫诏”（罗贯中著，1979：39），利用了天下“怒卓专横”的局势，以天子之名私自召集各方诸侯起兵联合对付董卓。这表面上看似正确的事情，实际上带出了：一、有此先例，日后曹操便能随意矫诏，尤其是将天子置于掌中之时；二、无论是矫诏或是屈身董贼，都是当时被普遍认为的大奸之举。曹操的奸雄形象已由此开始展露出来。

在小说第四十回〈蔡夫人议献荆州〉中，曹操为了兵不血刃取得荆州，便数次假意答应刘琮让其永为荆州之主。结果刘琮果然上当，白白的将整个荆州奉送给曹操。接着曹操便以荆州战乱为名，让刘琮家小离开荆州到别处去任官，并在途中将他们全数杀死。（罗贯中著，1979：349—351）这是由于曹操担心若将刘琮留在荆州的话，很可能会给自己的统治地位带来不必要的影响。因此曹操虽用智谋不费一兵一卒的坐稳了荆州，然而却是大奸之谋。

小说第十七回〈曹孟德会合三将〉中亦生动描写了两则突显曹操“奸雄”形象的情节。由于袁术僭位称帝，曹操便打着讨贼的旗号与刘备等人前往征讨。当曹军陷入了与敌军对峙的僵局中，而随军的粮食也开始出现短缺的情况时，曹操便对粮官王垕说“欲借汝头以示众耳……不杀汝，军必变矣。”（罗贯中著，

1979：156）于是便给王垭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斩首，军心果然也得到了稳定。

此外，曹操再转而攻打张绣时，由于要争取民心，于是便号令三军“**皆下马以手扶麦**”。突然曹操的马由于受惊而奔入麦田中踩坏了一大片麦田，于是曹操便以军令为由装模作样地“**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后来经过郭嘉的劝解，曹操才“**割发权代首**”，并传示三军。（罗贯中著，1979：157—158）以上虽说是一个军事家的杰出谋略，然而在小说的刻画中，却更加突显了曹操的“奸雄”形象。

曹操在官渡之战时一度因为粮草不济而无计可施，恰好此时袁绍的谋士许攸前来投奔，曹操于是赶紧捉住时机，“**不及穿履，跣足出迎……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罗贯中著，1979：266）然而，这一系列的举措不过是为了要从许攸那里求得脱困之策，以及套出袁军的情报罢了。后来曹操终于完全瓦解了袁氏的势力，并统一河北。然而，曹操对堪居首功的许攸其自满的态度却越来越厌恶。直到后来许攸被许褚所杀时，曹操只是“**何故杀之……深责许褚**”（罗贯中著，1979：290）。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曹操既求贤若渴，而在人尽其才后又鸟尽弓藏的“奸雄”的一面。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既具雄才伟略，而又常犯杀戮之人。只是在《三国志》的整体记载中，曹操的缺点在其优点前明显是黯然失色。但是，小说《三国演义》却将其缺点无限放大并渲染扩张，使得曹操的负面形象几乎

成为曹操的定性诠释。然而，从曹操个人在《三国演义》中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来看，就能发现其中还是贬中带褒，甚至褒贬共存的。（王作宾，2008：173）因此，“奸雄”一词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来说，最好的诠释就是“奸诈的英雄”。此外，由此可见曹操在《三国演义》中的角色定位乃至形象刻画，与正史《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曹操之本来面貌，实际上还是有着相当程度上的落差。

第四章、曹操形象的历史演变

此章分两节统摄，并以历代各类相关典籍以及文献为主要探讨对象。为避免混淆，将按朝代的顺序进行论述。第一节说明西晋至隋唐时期，而第二节则说明北宋至明清时期，以此探析出曹操形象在历史上所历经的各种变化及发展，以及浅说异化的个中因素。

第一节、西晋至唐——负面形象的形成及发展

从有系统性的文字记叙来看，关于曹操的形象记载其实最早可追溯至三国时期。当时三国中已有官修史书者，如魏国鱼豢的《魏略》、王沈的《魏史》、吴国韦昭的《吴书》等。陈寿的《三国志》主要是根据上述的史料，并进行多方面的采集、考证、取舍后所编撰而成的。（张舜徽主编，1990：79）当然，陈寿的《三国志》最初属于私修而非官修。直到陈寿死后，范頔等人上表晋惠帝，《三国志》才正式被纳为官方史书。（【唐】房玄龄等撰，1974：2137—2138）虽然《三国志》中对曹操的记载的确存有部分的曲笔现象，但是对于其缺点陈寿还是有隐约地作出少许批评，且由于陈寿的取材严谨、文笔简练、客观独到等的写史精神，使得《三国志》的史书地位也得到了后世极大的肯定⁶⁰。

⁶⁰ 陈寿之所以以“三国”命名，其中就含有客观的深意。此外，《三国志》一书最大的特点为辟谣，即陈寿能在当时众多的“史料”中作出准确的判断以及合理的筛选。因此赵翼也说，“三国志虽多回护，而其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见【清】赵翼著（1984），《廿二史劄记校证》（上册），页125。

（章惠康，2000：18）因此，在西晋时期，以《三国志》为代表，曹操的形象基本上毫无疑问是正面的⁶¹。

东晋时期的史学家习凿齿编的《汉晋春秋》以及袁宏所编的《后汉纪》，首开史籍中的“帝蜀寇魏”之例。（陈颖，2010：93）其中习凿齿以个人观点，提出曹魏的篡逆之说，“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甚至连孙吴臣子都被指斥为逆贼，“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何由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邪”；而只有蜀汉才是三国之中的正统，“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也……将使汉室亡而更立”。⁶²（【清】汤球辑，1937：1—4）袁宏虽然没有如习凿齿般的态度明确，但从其对荀彧之评中就可以看出其“贬魏”的思想，“刘氏之失天下，荀生为之也……虽名盖天下而道不合顺”。（【晋】袁宏著，2002：581—582）《汉晋春秋》直接以刘备为“纪”，一改陈寿《三国志》中以曹操为“纪”的做法；而《后汉纪》则是以汉献帝的年号为“纪”。于此虽然对曹操的形象还不构成直接性的影响，但曹魏的帝统地位却开始受到动摇，对于后世之“帝蜀寇魏”思想有着先驱意义。

曹操形象的大幅度变化始于南朝时期。南朝宋之文学家刘义庆主导编撰了《世说新语》⁶³，后来南朝梁的刘孝标为之作注，引用古书数百种，很大程度的丰富了原著的内容。其性质为小说，内容上则广泛采集许多前人的逸闻轶事，

⁶¹ 曹操在《三国志》中形象，详见本论文第二章。

⁶² 钱大昕就对习凿齿的这种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溯其本源，将蜀、吴消灭，一统天下的是晋朝，而晋朝实际上乃是出于魏朝，然陈寿写史时仍能以《三国》命名而不单名“魏”，可见陈寿的秉笔之公；习凿齿的舆论之谬。详见陈文和主编（1997），《嘉定钱大昕全集》（第玖册），页383—384。

⁶³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唐朝时称《世说新书》，称《世说新语》约起于南宋时期。由于对《世说新语》的探讨并非本章节的重点，故而略作简介，余不赘论。

以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出汉末魏晋时期人物的言谈举止，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士农工商。（袁行霈，2003：204—207）曹操在《世说新语》中的形象可以说基本是负面的，虽然还不至于大奸大恶，然而其狡诈、残忍、无赖的性格却已被生动的刻画了出来。这些在《假谲》、《容止》、《忿狷》⁶⁴等篇的故事中都十分明显。（吴代芳，2001：53）由于《世说新语》在文学、艺术领域上的影响，因此曹操的形象也逐渐趋向于奸险的一面。

如果说《世说新语》是从文学角度促成曹操形象发展的话，那么从史学角度来说当属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以及范晔的《后汉书》了。由于宋文帝觉得陈寿的《三国志》虽说“事多审正……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因此就下诏裴松之，“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务在周悉。”（【晋】陈寿撰，1964：1471）自陈寿死后直至宋文帝的百余年间，出现了大量有关三国记载的文献，单就裴松之作注时所引用的相关书目就达两百余种⁶⁵。（杨耀坤、伍野春著，1998：256—259）裴松之作注时以“绩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晋】陈寿撰，1964：1471）的方式广泛取材，因此其对曹操形象的影响基本上是两面性的：一、加强了曹操的英雄形象，具体表现在其军事和政治方面；二、曹操奸险的形象也得到升华，具体表现在其嗜杀和待人处事方面⁶⁶。

⁶⁴ 篇幅所限，兹不举例。《容止 1》〈魏武见匈奴使〉；《假谲 4》〈魏武梦中杀人〉；《忿狷 1》〈魏武杀歌妓〉等都是《世说新语》中对曹操奸险形象的典型刻画。

⁶⁵ 具体数量历来有诸多不同的见解。据伍野春统计一共有二百二十九种，除去经部书籍，有二百零一种是魏晋之际有关三国史的著述。详见杨耀坤、伍野春著（1998），《陈寿、裴松之评传》，页 260。

⁶⁶ 在英雄形象方面，裴松之注引《魏书》加强了曹操模仿孙臆围魏救赵的军事谋略，“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最后打败了黑山贼；在奸险形象方面，裴松之注引《曹瞞传》加强了曹操少时的狡诈个性，“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最后成功离间了父亲对叔父的信任。详见【晋】陈寿撰（1964），《三国志》（第一册），页 2—9。兹举二例，余不赘述。

此外，范曄所编撰的《后汉书》对曹操的形象也有一定的影响。范曄于《后汉书》中总结了东汉历代皇帝的为政得失，其中更是揭露了宦官参政和外戚专权所带来的政治弊端。（张越编，2009：100）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范曄修史时并没有如陈寿修史时的政治因素限制，加之其“**贵德义，抑势利……黜奸雄**”（【清】王鸣盛著，2005：487）的主导思想，因此《后汉书》则不必为曹操作出回护，甚至直接批评。《后汉书》虽然没有单独给曹操立传，但是从各相关散传中结合来看有关曹操形象的记载，几乎都是负面的，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其嗜杀、专权的一面⁶⁷。概括来说，曹操形象在《三国志》裴注中是有褒有贬的；在《世说新语》中则基本是负面的；而在《后汉书》中则是负面的。

隋代几乎没有任何能表明曹操形象的文献。但能确定的是，以三国为题材的故事在当时就已流传，并开始表现在艺术内容上。《太平广记·水饰图经》中就载有隋炀帝观看水上杂戏，如“**曹瞒浴谯水。击水蛟……刘备乘马渡檀溪……若此等总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李昉等编，1986：1736）直到唐代，曹操的形象已进入到文学、俗文学⁶⁸之中，并在话本和杂剧中相继的丰富和完善。

诗歌方面，据《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收录的有关三国题材的唐诗，至少一百四十首，其中直接提及或涉及曹操形象的有至少有十四首⁶⁹，当中有褒也有贬。

⁶⁷ 前已略提，见本论文第二章第二节。

⁶⁸ 郑振铎指出，所谓俗文学，其定义广泛。约而言之，即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的东西，如：小说、戏曲、弹词等，皆属于俗文学的范畴。详见郑振铎著（1984），《中国俗文学史》（上册），页1—2。

⁶⁹ 详见朱一玄、刘毓忱（1983），《三国演义资料汇编》，页2—7。另，诗歌的意境和诗人的写作背景等皆不在本章节的讨论范围之内。

如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⁷⁰、张说的《邺都引》⁷¹、张鼎的《邺城引》⁷²等都是赞扬曹操的英雄功绩；而李邕的《铜雀妓》⁷³、胡曾的《咏史诗·官渡》⁷⁴、徐夔的《魏》⁷⁵等则是贬斥曹操奢靡好色的奸雄形象。如果说曹操的形象于诗文中是褒贬参半，那么在小说中则是趋向于负面。唐代志怪兼志人小说《独异志》中载有若干关于曹操的故事，其中几乎都是负面的，仅从〈魏武借头〉、〈曹操凶残〉、〈曹操奸诈〉、〈魏武好杀重艺〉等故事篇名就可以看出。（【唐】李冗撰，1983：5—13）其中有些内容是继承自《世说新语》，然而却把曹操残忍、奸诈的形象给进一步升华。

唐玄宗时有一位叫大觉的僧人在其《四分律行事钞批》中提到了诸葛亮的故事，“吾死已后。可将一帛土。置我脚下……遂不敢交战……魏人方知。寻往看之。唯见死人……孔明之策也。时人言曰。死诸葛亮怖生仲达。”（藏经书院编，1993：29—30）从其“时人言曰”就可以看出他引用的这段故事是来自民间传说⁷⁶。因此可以确定，早在初盛唐时期，有关三国题材的故事就已经完备，并且流传于民间。这当中显然有着“说话人”的影响，即在民间以话本的形式来讲唱三国的故事⁷⁷。（【俄】李福清著，1997：33—35）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无论在民间

⁷⁰ 见附录一（二）。

⁷¹ 见附录一（二）。

⁷² 见附录一（二）。

⁷³ 见附录一（二）。

⁷⁴ 见附录一（二）。

⁷⁵ 见附录一（二）。

⁷⁶ 唐代胡曾有《咏史诗·五丈原》一首，其中的“长星不为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指的就是诸葛亮即死，其将星陨落的情况。详见编辑部点校（2013），《全唐诗：增订本》（第十册），页7477。显然这也是民间传说的一种。

⁷⁷ 鲁迅于〈宋之话本〉中指出：“说话者，谓口说古今惊听之事，盖唐时亦已有之”，即此。详见鲁迅著（2005），《鲁迅全集》（第九卷），页116。

传说或是诗文创作中，诸葛亮的形象得到了非常高的提升⁷⁸，如《史通卷五·採撰》所言：“**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唐】刘知幾撰，1978：117）可见，诸葛亮神化的形象已经开始普遍于民间。

刘知幾亦不认同陈寿《三国志》中以曹魏为正统的做法，他提出：“**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又认为刘备是“**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并且还批评陈寿写蜀汉人物时“**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于此，刘知幾非常认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以蜀汉为纪年的做法。他认为习凿齿“**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唐】刘知幾撰，1978：211—212）因此结合上文可以总结出，唐代是曹操形象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蜀汉人物形象的提升，以及曹操形象的逐步矮化，虽然此时两者并不相互抵触，甚至可以说是相互独立发展，但是毫无疑问的，对后世所形成的“尊刘贬曹”观念，是有着先驱意义的。

第二节、北宋至清——负面形象的深化及定型

北宋时期的曹操形象可以从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来谈。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觉得历代史书繁杂且缺乏系统性，因此作了《通志》八卷献给宋英宗，“**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元】脱脱等撰，1977：10762—10763）由于《资治通鉴》为官修史书，因此其内容在一定

⁷⁸ 唐诗有当中直接提及或涉及诸葛亮形象的至少有十七首，与曹操的褒贬并存不同，诸葛亮于唐诗中的形象几乎全是正面的，或赞扬其功绩，或哀悯其壮志未酬等。其中杜甫的《蜀相》以及《八阵图》在后世即被视为对诸葛亮功绩的最佳诠释。

的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北宋朝廷的态度以及立场。《资治通鉴》以曹魏作纪年，说明官方认同了曹魏的正统性⁷⁹。然而，司马光笔下的曹操形象却是有褒有贬的，其既褒扬了曹操在政、战方面的表现，同时也揭露了其奸险的一面⁸⁰，而在民间方面则是另一种情况。

从李商隐《骄儿诗》中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刘学锴、余恕诚著，2004：947）就可以看出，至少在中晚唐时连儿童对三国故事都已经非常熟悉，而三国人物的基本形象也已得到定型。北宋时期，据《事物纪原卷九·影戏》中载早在仁宗时，就有“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採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宋】高承撰，1989：495）《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中亦载至徽宗时，“说三分”已成为讲史中专门的一类，并已发展蓬勃，“霍四究说三分……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宋】孟元老撰，2007：462）可见三国故事在北宋基本已经有了成套的完整内容，而且还从原本的“说话”发展到了戏剧⁸¹。至于曹操的形象，《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载儿童们听三国故事时，“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⁷⁹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三国志六十五卷》曰：“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详见纪昀等原著（1997），《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页622。

⁸⁰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九·魏纪一》曰：“王知人善察……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然而，于《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汉纪六十》中又评操曰：“以魏武之暴戾强仇……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见【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1976），《资治通鉴》（第五册），页2174—2175。这样的评论可以说是较为公允的。

⁸¹ 鲁迅于《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中指出三国故事发展蓬勃的原因是，“盖当时多英雄……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因此成为了讲史的首选。详见鲁迅著（2005），《鲁迅全集》（第九卷），页134。

（【宋】苏轼撰，1997：7）且不论官方立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北宋时期“尊刘贬曹”的思想在普罗大众的心中已是根深蒂固。

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朱熹编的一部《资治通鉴纲目》，一改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纪年的作法。《朱子语类卷之一百五·通鉴纲目》载：“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宋】朱熹撰，2010：3459）朱熹不仅继承了前代“帝蜀寇魏”史学思想，并且在其笔下的曹操形象也几乎是负面的。在曹操进爵为公、王之后，朱熹称其为“魏公操”、“魏王操”或仍称为“操”，这里就显示了其贬斥的一面。此外，在曹丕建魏改元黄初后，朱熹还特别作了一个“凡僭国一”的注释。（【宋】朱熹撰，2010：902）具体表现在曹操形象方面的，是朱熹对曹操的政、战功绩一并不论，反而突出了其残酷、篡汉的叛贼形象。由于朱熹其独特历史地位的关系⁸²，因此《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也是远非前代的任何著作所能比拟的⁸³。

元代已有完整的三国故事话本出刊，即英宗时至治年间由建安虞氏书坊所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⁸⁴。曹操在《平话》当中的形象已经是挟天子以令诸

⁸² 《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对后来三国演义的成书影响很大。沈伯俊等人认为，《资治通鉴》的影响在于其编年体的体例；而《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则在于其以蜀汉为纪年的“尊刘贬曹”思想被后世的话本普遍吸收。详见沈伯俊、谭良啸编著（1989），《三国演义辞典》，页2—3。由此可见，《三国志平话》出现在南宋之后的元朝，绝非偶然。

⁸³ 蔡东州举例指出，南宋至清，对《三国志》的改修作品达十二种之多，且率皆“帝蜀寇魏”。这场改修三国历史之风可以说是倡导蜀汉正统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且这种动因的发端多受朱熹等人启发。详见蔡东州（1993），〈宋儒的魏蜀正伪论争与改修《三国志》之风〉，《四川师范学院学报》，页109—110。

⁸⁴ 鲁迅于《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中指出，平话的特点即“观其简率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然页必有图，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见鲁迅著（2005），《鲁迅全集》（第九卷），页134。

侯的奸雄。如刘备对诸葛亮提到：“然我闻赵高弄权，董卓挟势，曹操奸雄，献帝懦弱……”（编委会编，1994：67）从刘备把曹操比为赵高、董卓一类人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平话》的思想倾向。在元杂剧方面，其既吸收、演绎了前代所流传的三国故事，同时也从艺术方面不断地将其丰富、完善。据关四平统计，各种相关文献记载的三国元杂剧达有六十一一种，现剧本尚存者有二十一种，其余的已经佚失，仅存剧目或仅存残文而已。（关四平著，2001：182—184）六十一一种杂剧当中直接描写曹操的仅有六种⁸⁵，其余的绝大多数都是描绘蜀汉人物之杂剧。自宋元始，曹操“奸臣”、“奸贼”等的负面形象就已经全面定型。

《三国志平话》到底是“说话”人的底本，其虽然基本上齐备了一套完整的三国故事内容，但是在语言和文字上并没有经过润饰，因此就显得不够流畅和凝练⁸⁶。在经过了长期的群体创作和艺术演绎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通俗文学家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明】高儒等著，1957：82），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当中就已经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尊刘贬曹”思想。然而，曹操的形象却并非因此而倒向一面，反之，其形象于此得到了艺术性的大突破，即被塑造为一个复杂而丰富，多面而完整的一个耐人寻味的艺术形象。（何文，2010：247）简而言之，即生动地诠释了曹操所谓的“奸雄”形象，并将其具体化在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当中⁸⁷。

⁸⁵ 六种剧目为《曹操夜走陈仓路》、《阳平关五马破曹》、《相府院曹公勘吉平》、《白门斩吕布》、《蔡琰还朝》以及《左慈飞杯》。

⁸⁶ 《三国志平话》除了叙事条理有欠分明以外，还有许多民间的迷信色彩杂糅其中，如故事开篇就描写了韩信转世为曹操、彭越转世为刘备、英布转世为孙权、刘邦转世为汉献帝云云。此外，在遣词用字上也有许多名词上的错误，如作张角为张觉、司马懿为司马益、华容为滑荣、葭萌关为嘉明关等。详见编辑部编（1983），《三国演义研究集》，页313—314。

⁸⁷ 嘉靖本中的〈祢衡裸体骂曹操〉、〈曹孟德三勘吉平〉、〈曹操勒死董贵妃〉等都充分显示了曹操奸险及残忍的一面；而〈曹操起兵伐董卓〉、〈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乌巢烧粮草〉

曹操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虽说已是负面形象的存在，然而罗贯中本人对曹操却并没有那么的“爱憎分明”，至少对曹操的批评态度也还不算强烈。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在李贽《三国演义》评本的基础上，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回目和正文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也于其中作出了详细而主观的评点⁸⁸，并将之定位为“第一才子书”⁸⁹。其后因其普遍的认可，以及广泛的传播，致使毛评本一度成为主流版本，并成为现今流行本《三国演义》的最终定型版本。

较之罗本而言，毛评本的特点即将原本已有的“尊刘贬曹”之色彩作出更进一步的升华，突出了其对曹操强烈的贬抑之情。其具体操作表现在：一、对相关回目名称作出修改，如将罗本之曹操、孟德，改为曹阿瞞、曹贼等。二、对情节作出修改，如将罗本中原有之对曹操的赞诗赞文等统统删除，只留下并补充对曹操恶评之诗评。三、即使是曹操可观的一面，在其评点中也处处斥责其为奸诈以及虚伪等。⁹⁰最终形成了曹操“奸”大于“雄”的形象。

等则显示了其果敢、大度的一面。详见罗贯中著（1980），《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册），页1—2。此不赘述。

⁸⁸ 所谓评点，清人张潮在《虞初新志·凡例》中言：“兹集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余。或评其事而感慨激昂……既自怡悦，愿共讨论。”见【清】张潮辑（2002），《虞初新志》，页171—172。

⁸⁹ 清顺治年间有所谓的“十大才子书”，在当时也叫“天下必读才子书”。《三国演义》居其榜首，可见其认同度之普遍，也由此可见毛评本在当时的分量之重。详见邓加荣（2008），〈“十大才子书”的由来〉，《博览群书》，页72。

⁹⁰ 如于《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及第二十八回中，曹操不去追赶关羽的行为实际上是颇受人肯定的。然而，对此毛宗岗却指出，曹操其实是故意不给关羽过路文书，其背后深意是想借沿途的手下人杀害关羽，而自己既可以成全大义，不用背上害贤之名，同时也可以把即将成为日后劲敌的关羽给除掉。详见【明】罗贯中著（2016），《三国演义（注评本）》（第壹册），页252—262。由此可见毛宗岗对曹操的批评之深切。

综上所述，曹操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从整体上来说还是贬多于褒，甚至可以说是以贬为发展主流，从而又可以得出一种发展规律，即凡是大一统王朝，或国居中原的王朝，对曹操就没有那么的贬抑，甚或推崇。如：西晋、唐、北宋。反之，偏居一隅的王朝，尤其是汉族王朝，对曹操就大加贬抑，甚至丑化。如：东晋、南宋等。至如元、明、清，由于曹操的负面形象以及蜀汉人物的正面形象已经成为定音，加之文学艺术上的不断演绎，以及官方、民间的广泛认可，因此曹操的负面形象遂成定型。（杨静静，2012：21—26）究其缘由，曹操形象的每次转型均与当时的政治、民族形势和道德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东晋、南宋等，都是在统一的汉族王朝灭亡以后，南迁而立之偏安王朝，其处境在性质上就与刘备之建立蜀汉类似。由于政治背景使然，而导致了“帝蜀寇魏”之现象的产生。（单长江，1999：62）这一现象可以说实际上也是人们之文化心理上的变化过程。至于元末至清初，人民经常处于被外族侵略或身处于国内战乱的痛苦中。因此或渴望和平的大众，或捍卫汉族正统的人士，自然会有“人心思汉”、“身在曹营心在汉”等心理，使得与“正统蜀汉”为敌的曹操逐步被贬抑成“奸贼”，并为人们所挾伐⁹¹。（王洪娟，2011：113）因此，曹操形象的戏剧性变化都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正统观念⁹²，在特定条件下的反映⁹³。

⁹¹ 类似的情况在《论语·子张第十九》中有所提及，“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2010）《朱子全书》（第六册），页237。

⁹² 梁启超于《新史学·论正统》中说道：“言正统者……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见梁启超著（2008），《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页：20。我们虽然不能“以今诤古”，然此言确实有理。

⁹³ 文末将附上曹操形象之历史演变简表，以备浏览。详见附录二表（二）。

结语

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有着政治立场上的主要限制考量，因此《三国志》中对于曹操的部分记载出现了曲笔回护的现象。这种现象则主要表现在其性格方面，即所谓的“多所残戮”。从一名史学家的观点角度出发，这种个人性格上的缺点，其重要性当然远不如其自身的雄才大略，以及对于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因此可以说陈寿在很大的程度上呈现出了极具历史进程意义的“曹操”。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曹操所值得肯定的一面，因此《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是褒胜于贬的。

至于小说《三国演义》，由于其鲜明的“尊刘贬曹”之指导思想的关系，曹操的形象才会出现与《三国志》相比之下大相庭径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使小说的情节变得更为精彩，能够迎合普罗大众阅读的“口味”，因此才会“牺牲”曹操，将其原来的某些缺点给无限的扩张放大，以衬托出形象被大幅度提升的蜀汉主要人物。

然而，“魏武”其本身的历史光辉使得其雄才大略的一面还是得以在进入小说后仍得到了全面性的保存。约而言之，即使曹操的形象经过了艺术化的千锤百炼，也还是无法将其完全的转变为一个“奸”人。这种“奸”化与本“雄”，在经过了长时间不断的冲突、结合、改造、定型的发展情况下，最终

才造就了曹操“奸雄”的完美文学形象。因此，从小说《三国演义》看来，曹操的形象则是贬甚于褒。

综上所述，《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在经过两相对比之下，其褒贬高下立判。虽说一者为史籍；一者为文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然而历史的进程证明了曹操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是以贬为主流，其文学形象的影响甚至要超越了其史籍形象的影响。于此历朝历代对于曹操形象的“塑造”，就与其从历史形象最终过渡到文学形象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几经抽丝剥茧后得知，曹操形象的历史演变都和当时该朝代的政治状况和民族形势有关。

其中的发展规律即为，越是汉族王朝受到压迫的时代，曹操的形象就会随之不断地被贬值。这当中有着历史与文学并行的双重因素，即官方的“君弱臣强”以及强调“偏安”的正统观，与此同时民间又不断地抬高蜀汉人物的地位，和丑化曹操形象所致。因此，曹操最终会在《三国演义》中得到“奸雄”形象的高度定型，也就可想而知了。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 安作璋、熊铁基著（1984），《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济南：齐鲁书社。
2.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1987），《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3. 陈建功名誉主编；傅光明主编（2006），《插图本纵论三国演义》，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4. 陈其欣选编（1998），《名家解读三国演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5. 陈文和主编（1997），《嘉定钱大昕全集》（第玖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6.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1964），《三国志》（第一、二、四、五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7.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2009），《三国志集解》（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8.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2007），《杜诗详注》（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9.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1973），《后汉书》（第二、八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0. 方北辰著（2016），《精彩三国》，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
11. 方北辰、谭良嘯主编（2015），《三国故事真与假 100 例》，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
12. 【唐】房玄龄等撰（1974），《晋书》（第五、七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3. 【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4. 【明】高儒等著，《百川书志 古今书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15. 高秀芳、杨济安编（1980），《三国志人名索引》，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6. 《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1994），《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7. 关四平著（2001），《三国演义源流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8. 何兹全著（1994），《三国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原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1997），《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20. 黎东方著（2013），《黎东方讲史·细说三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1. 李伯勋撰（1997），《诸葛亮集笺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2. 李昉等编（1986），《太平广记》（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23. 【俄】李福清著；伊锡康、田大畏译；田大畏校订（1997），《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4. 李厚基、林骅（1984），《三国演义简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5. 【唐】李冗撰；张永钦、侯志明点校（1983），《独异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26. 梁启超著（2008），《饮冰室合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27. 刘学锴、余恕诚著（2004），《李商隐诗歌集解》（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28. 【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1978），《史通通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9. 鲁迅著（2005），《鲁迅全集》（第三、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0. 罗贯中（1979），《三国演义》（上、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1. 罗贯中著（1980），《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32. 【明】罗贯中著；【清】毛宗岗评（2016），《三国演义（注评本）》（第叁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3. 吕思勉著（2015），《三国史话》，北京：中华书局。
34. 【宋】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35. 缪钺著（2004），《缪钺全集》（第 1、4 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36. 《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编（1983），《三国演义研究集》，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7. 沈伯俊、谭良啸编著（1989），《三国演义辞典》，成都：巴蜀书社出版。
38.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1976），《资治通鉴》（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39. 【宋】苏轼撰；王松龄点校（1997），《东坡志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40. 【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1999），《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
41. 台湾三军大学编（1983），《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四册），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
42. 谭良啸、张大可主编（1992），《三国人物评传》，台北：水牛出版社。
43. 【清】汤球辑；王云五主编（1937），《汉晋春秋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
44. 陶元珍著（1935），《三国食货志》，上海：商务印书馆。

45. 【元】脱脱等撰（1977），《宋史》（第三十一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46. 【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2005），《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47. 王先霏、胡亚敏主编（2005），《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48. 魏宏灿校注（2009），《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49. 【唐】魏征、令狐德棻撰（1982），《隋书》（第二、三、四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50. 吴金华（1990），《三国志校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51. 夏传才注（1986），《曹操集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52. 【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1987），《六臣注文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53. 【宋】熊方等撰；刘祐仁点校（1984），《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54. 杨耀坤、伍野春著（1998），《陈寿、裴松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55. 余嘉锡笺疏（2007），《世说新语笺疏》（中册），北京：中华书局。
56. 俞绍初校点（1980），《王粲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57. 【晋】袁宏著；张烈点校（2002），《后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58. 袁行霈主编（2003），《中国文学史》（第二、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59. 藏经书院编（1993），《卍续藏经》（第六十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
60. 【清】张潮辑（2002），《虞初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1. 张大可著（2003），《三国史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
62. 张可礼编著（1983），《三曹年谱》，济南：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63. 张舜徽主编（1990），《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64. 张越编（2009），《《后汉书》、《三国志》》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5. 张作耀著（2000），《曹操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66. 张作耀著（2004），《刘备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67.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1984），《廿二史劄记校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68. 赵幼文校笺；赵振铎等整理（2001），《三国志校笺》（上册），成都：巴蜀书社。
69. 郑振铎著（1984），《中国俗文学史》（上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70.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2013），《全唐诗：增订本》（第二、三、十、十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71. 周天游辑注（1986），《八家后汉书辑注》（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72.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2010），《朱子全书》（第陆、捌、拾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73. 朱一玄、刘毓忱（1983），《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二、学位论文

1. 何文（2007），《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人物形象流变研究》，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西安。
2. 杨静静（2012），《朱熹论三国》，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温州大学，温州。
3. 张检（2015），《曹操形象文学传播研究》，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三、期刊论文

1. 蔡东洲（1993），〈宋儒的魏蜀正伪论争与改修《三国志》之风〉，《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10月28日第05期，页104—110。

2. 陈颖（2010），〈曹操的历史 历史的曹操——对曹操形象的历史哲学浅思〉，《成都大学学报》，2010年12月15日第06期，页93—97。
3. 单长江（1992），〈曹操形象异化的时代价值取向〉，《鄂州大学学报》，1992年02月15日第01期，页62—66。
4. 傅隆基（2000），〈曹操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典型的演化〉，《华中理工大学学报》，2000年02月29日第01期，页100—105。
5. 王改萍（2010），〈试析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描述为视角〉，《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02月01日第01期，页117—119。
6. 王洪娟（2011），〈变形与还原——文学与历史视野里的曹操形象〉，《长城》，2011年10月15日第10期，页112—113。
7. 汪正章（1985），〈诸葛亮的形象体现济世安民的政治理想——兼谈曹操形象的意义〉，《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06月30日第03期，页128—134。
8. 王作宾（2008），〈浅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二重性〉，《科教文汇》，2008年05月10日第05期，页172—173。
9. 魏巍（2015），〈从《武帝纪》看陈寿的尊魏思想〉，《宜宾学院学报》，2015年08月25日第08期，页69—74。
10. 吴代芳（2001），〈论《世说新语》刻画的曹操形象及其发展〉，《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08月25日第04期，页53—56。

11. 余如忠（1997），〈论《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变异〉，《台州师专学报》，1997年10月15日第05期，页38—41。
12. 章惠康（2000），〈记述三国史的著名史籍——《三国志》述评〉，《衡水师专学报》，2000年05月15日第02期，页15—20。
13. 邓加荣（2008），〈“十大才子书”的由来〉，《博览群书》，2008年02月01日第02期，页72—75。

附录一

（一）、曹操之相关诗、文

1. 《军令》（节录）

吾将士无张弓弩于军中，其随大军行，其欲试调弓弩者，得张之，不得著箭。犯者鞭二百，没入。吏不得于营中屠杀卖之，犯令，没所卖，及都督不纠白，杖五十……军行，不得斫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枣。（夏传才注，1986：188—189）

2. 《船战令》

雷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櫓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

（夏传才注，1986：189）

3. 《步战令》（节录）

麾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有不进者，什长杀之；什长有不进者，都伯杀之。督战部曲将，拔刃在后，察违令不进者斩之。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临战兵弩不可离阵。离阵，伍长什长不举发，与同罪。无将军令，妄行陈间者斩。（夏传才注，1986：190）

4. 《短歌行》其二（节录）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夏传才注，1986：24—25）

5. 《求贤令》（节录）公元二零一年（建安十五年）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
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
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夏传才注，1986：123）

6. 《举贤勿拘品行令》（节录）公元二一七年（建安二十二年）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
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
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夏传才注，1986：162）

7. 《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踳踳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夏传才注，1986：5—6）

8. 《置屯田令》公元一九六年（建安元年）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夏传才注，1986：59）

9. 《蠲河北租赋令》公元二零四年（建安九年）

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夏传才注，1986：85）

10. 《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公元二零九年（建安十四年）

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廩，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夏传才注，1986：119—120）

11. 《贍给灾民令》（节录）公元二一八年（建安二十三年）

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廩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贍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夏传才注，1986：168）

12. 《选军中典狱令》公元二一四年（建安十九年）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夏传才注，1986：154）

13. 《以高柔为理曹掾令》公元二一四年（建安十九年）

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汉祖除秦苛法，萧何定律。掾清识平当，明于宪典，勉恤之哉！（夏传才注，1986：156）

14. 《让县自明本志令》（节录）公元二一零年（建安十五年）

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有人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梟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位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夏传才注，1986：127—128）

15. 《终令》（节录）公元二一八年（建安二十三年）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夏传才注，1986：168—169）

16. 《遗令》（节录）公元二二零年（建安二十五年）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夏传才注，1986：178）

（二）、曹操以外之相关诗文

1. 王粲《七哀诗》其一（节录）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俞绍初校点，1980：6）

2. 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节录）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唐】杜甫著，2007：1148）

3. 张说《邺都引》（节录）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
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
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

（编辑部点校，2013：935）

4. 张鼎《邺城引》（节录）

君不见汉家失统三灵变，魏武争雄六龙战。

荡海吞江制中国，回天运斗应南面。

隐隐都城紫陌开，迢迢分野黄星见。

（编辑部点校，2013：2112）

5. 李邕《铜雀妓》（节录）

直节岂感激，荒淫乃凄其。颍水有许由，西山有伯夷。

颂声何寥寥，唯闻铜雀诗。君举良未易，永为后代嗤。

（编辑部点校，2013：1169）

6. 胡曾《咏史诗·官渡》

本初屈指定中华，官渡相持勒虎牙。

若使许攸财用足，山河争得属曹家。

（编辑部点校，2013：7489）

7. 徐夔《魏》

伐罪书勋令不常，争教为帝与为王。

十年小怨诛桓邵，一檄深雠怨孔璋。

在井蛰龙如屈伏，食槽骄马忽腾骧。

奸雄事过分明见，英识空怀许子将。

（编辑部点校，2013：8249）

附录二

表（一）、曹操之相关大事年表⁹⁴

公元	年号	大事
一五五年	汉桓帝永寿元年	曹操一岁 生于沛国谯县的一个宦官家庭。
一七四年	汉灵帝熹平三年	曹操二十岁 举孝廉 ⁹⁵ ，除洛阳北部尉 ⁹⁶ ，执法不避豪强。
一七七年	汉灵帝熹平六年	曹操二十三岁 因得罪权贵而被调任顿丘令 ⁹⁷ ，后又被征召拜为议郎 ⁹⁸ 。
一七八年	汉灵帝光和元年	曹操二十四岁 堂妹夫宋奇被诛，因受株连免官归乡。
一八零年	汉灵帝光和三年	曹操二十六岁

⁹⁴ 本表于编写时参考了陈寿《三国志》、张可礼《三曹年谱》等书的部分资料。难以确切考订具体年份之事迹等，则不录于本表中。

⁹⁵ 孝廉即孝子廉吏。举孝廉是两汉时期由各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人才的一种选官制度。其中大多是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是汉代士子们入仕的正途。详见安作璋、熊铁基著（1984），《秦汉官制史稿》（下册），页 314。

⁹⁶ 东汉洛阳设有东、西、南、北四部县尉。北部尉即分管洛阳北部治安的县尉。同上。页 167。

⁹⁷ 汉代大县（万户以上）的行政长官称为“令”，小县（万户以下）的行政长官称为“长”。同上，页 152。

⁹⁸ 议郎是“郎”官中地位较高的一种，隶属于光禄勋（宫内一切事务总管）。主要负责公文、顾问应对等事物，并能参与朝政。同上（上册），页 119。

		再次被征召为议郎。
一八二年	汉灵帝光和五年	曹操二十八岁 上书弹劾三公，指其贪赃枉法，袒护权贵。
一八四年	汉灵帝中平元年	曹操三十岁 黄巾起义爆发。被任命为骑都尉 ⁹⁹ ，参与镇压颍川黄巾军，后因功被升为济南相 ¹⁰⁰ 。在任上奏免贪官，禁断淫祀。因屡屡得罪权贵，恐惹祸杀身，故辞官。
一八八年	汉灵帝中平五年	曹操三十四岁 朝廷设西园八校尉，操为典军校尉 ¹⁰¹ 。
一八九年	汉灵帝中平六年	曹操三十五岁 董卓专权。欲表操为骁骑校尉 ¹⁰² ，操不就，逃归乡里。后散家财，于陈留聚兵起义讨董。
一九一年	汉献帝初平二年	曹操三十七岁

⁹⁹ 骑都尉，汉武帝始置。是掌管羽林骑（皇帝的禁卫军）的军官。详见安作璋、熊铁基著（1984），《秦汉官制史稿》（上册），页 117。

¹⁰⁰ 济南相即济南国（诸侯国）的国相，即国中的最高行政长官。同上（下册），页 245。

¹⁰¹ 典军校尉是汉灵帝时“西园八校尉”之一，属于特设校尉的一种，地位相当于九卿。负责统率皇帝禁卫军的其中一个军团。同上（上册），页 250。

¹⁰² 亦属于特设校尉的一种。董卓进京后收编了朝廷的军队，按董卓欲收拢曹操的情况来看，骁骑校尉的职权应比曹操原本的典军校尉的职权还要更大。

		引军入东郡，破黑山军，为东郡太守 ¹⁰³ 。
一九二年	汉献帝初平三年	曹操三十八岁 被迎为兖州牧 ¹⁰⁴ 。大破青州黄巾军，收降兵三十余万，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
一九三年	汉献帝初平四年	曹操三十九岁 败袁术。因父嵩为陶谦部将所杀，举兵攻徐州，大肆屠杀。
一九六年	汉献帝建安元年	曹操四十二岁 引军拥天子都许，任司空，行车骑将军。始兴屯田。
一九八年	汉献帝建安三年	曹操四十四岁 前后一年，征张绣，败袁术，擒杀吕布。袁术死，张绣降操。
二零零年	汉献帝建安五年	曹操四十六岁 灭董承三族。东征刘备，得徐州，关羽降操。斩颜良于白马，斩文丑于延津。于官渡大败袁绍。

¹⁰³ 太守也称郡守，是一郡当中的最高官吏。从执行中央命令到管理郡内辖县等。东汉末年太守的职权之大甚至可以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详见安作璋、熊铁基著（1984），《秦汉官制史稿》（下册），页 54。

¹⁰⁴ 州牧也称州刺史，其本质相同，然而州牧的职权更大更广。东汉末年的州牧，已经不再是地方长官的性质，而是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州的实际统治者。同上，页 29。

二零七年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	曹操五十三岁 大败乌桓。至年，袁氏势力尽除，北方皆平。
二零八年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曹操五十四岁 罢三公官，自为丞相。南征刘表，表卒，子刘琮降操。孙刘联军败曹操于赤壁。
二一一年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	曹操五十七岁 大破马超、韩遂，平定关中。
二一四年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	曹操六十岁 前后一年，进爵魏公，以三女为献帝贵人。杀伏后子二人、宗族百余人，立中女曹节为皇后。西征张鲁，平定汉中。
二一九年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曹操六十五岁 汉中之战败于刘备。关羽水淹七军后，操亲征关羽，徐晃、曹仁大败关羽。
二二零年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 (汉献帝延康元年， 魏文帝黄初元年)	曹操六十六岁 病死洛阳，曹丕嗣位。改建安为延康，后逼献帝禅位，改元黄初，追尊操为太祖武皇帝。

表（二）、曹操形象之历史演变简表¹⁰⁵

相关朝代	代表人物/文献	主要内容/褒贬
西晋	陈寿《三国志》	多有曲笔，以褒为主。
东晋	习凿齿《汉晋春秋》	尊蜀非魏，以贬为主。
	袁宏《后汉纪》	同上，以贬为主。
南朝宋、齐	刘义庆《世说新语》	始立曹操文学形象，多有贬抑。
	裴松之《三国志注》	加强军、政形象，深化奸险性格，褒贬并存。
	范晔《后汉书》	“黜奸雄”，批评专横。以贬为主。
唐	相关唐诗	讴歌批评，褒贬并行。
	李冗《独异志》	继承、加强《世说新语》的相关内容，以贬为主。
	刘知畿《史通》	尊蜀非魏，认为曹操弑后逼君，以贬为主。
北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	以曹魏纪年，但对曹操褒贬并存。
	民间“说话”人	采摭前人资料，不断以艺术加工，对曹操以贬为主。

¹⁰⁵ 本表是根据本论文中的第四章内容精简编成。

南宋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突出曹操奸险、篡逆的形象，以贬为主。影响甚大。
元	虞氏书坊《全相三国志平话》	宋元三国话本之集大成，对曹操的负面形象已基本定型，以贬为主。
	元杂剧	大多渲染蜀汉人物，对曹操则是奸臣、奸贼的负面形象，以贬为主。
明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	鲜明的“尊刘贬曹”思想，生动刻画了曹操“奸雄”的形象，以贬为主。
清	毛氏父子修订、评注《三国志演义》	“奸”甚于“雄”，负面形象全面定型，以贬为主。